

# 中国抗疫国际合作的历史回顾与经验启示

刘 芳

**摘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在抗疫实践中从向西方学习逐渐转为贡献中国智慧,抗疫国际合作范围不断扩展,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并越来越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这些历史和经验启示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好政治主导力量,要持续提升自主科研和创新能力,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全球视野助力联防联控国际合作,要以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合作应对体系的建立。

**关键词:**抗击疫情 国际合作 历史经验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1)03-0054-07

DOI:10.19624/j.cnki.cn42-1005/c.2021.03.006

习近平总书记说:“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sup>[1]</sup>在中国积极投身全球合作抗疫的关键时期,回顾近代以来中国抗疫国际合作的历史,有助于从古今中外的对比中总结经验、获得启示。

## 一、中国抗疫国际合作的历史回顾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中国第一次参与抗击疫病的重大国际合作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

1910至1911年席卷全东北的大鼠疫,起源于满洲里一个农民打死病旱獭并剥食后的感染;随后,疫情沿铁路线迅速蔓延至东三省各地。<sup>[2]</sup>鼠疫爆发后,当时在东北拥有势力范围的俄国与日本率先提出要进行国际合作,它们不仅以防疫为名立关设卡,而且扬言中国无人可领导防疫,并以此为借口,从本国调遣人员深入中国东北。美、英、德等国也陆续向中国派出医学专家。俄国借此向列强游说,主张各国医生抵达后在哈尔滨召开万国防疫会议。<sup>[3]</sup>清政府深感防疫主权不可丢,而且也可借机向外国学习先进防疫经验。1911年4月,由中国政府主导,在奉天召开

了万国鼠疫研究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会议历时三周,12个国家共34名代表参加,130人列席会议,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东北鼠疫防控的许多技术与理论问题:第一,在疫源地和疫源物问题上,多国专家共同认定,本次鼠疫并非起源中国,而是来自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旱獭和老鼠都可传播;第二,就染疫房屋是否要焚毁这一问题,当时中外爆发过几次冲突,后经各国专家一致同意,染疫房屋不用烧毁,消毒后就可再用;第三,会议还明确了大豆、粮食以及皮货等商品不会传染疫病,东北仍可出口。<sup>[4]</sup>万国鼠疫研究会不仅引进学习了西方先进的防疫理念,而且让经过实践检验的中国防疫成果获得了国际承认,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合作意义。<sup>[5]</sup>

第二阶段:民国时期。据统计,从1912至1949这三十八年间,死亡万人以上的自然灾害就有75次,其中瘟疫流行造成的疫灾达到19次。<sup>[6]</sup>国际社会对此时医疗卫生还比较落后的中国施予了许多人道主义援助。国际联盟卫生组织(The Health Organiz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自1920年成立之后,在流行病调查、港口检疫、防疫组织现代化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许多指导和帮助。抗日战争爆发后,国联卫生组织专门派遣瑞士医生摩什(Moser)、英国医生罗伯生(Robertson)、法国医生拉斯克(Rusk)各率1支国际防疫队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分别开展斑疹伤寒、肠道传染病以及疟疾、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sup>[7]</sup>美国公共卫生处也曾于1939年、1941年派遣医生到中国帮助防治瘧疾、疟疾等传染性疾病。<sup>[8]</sup>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东北、热河等地鼠疫爆发,苏联派遣了一支由专家、防疫员、消毒员和护士共32人组成的防疫医疗队来华援助中国抗疫灭病。<sup>[9]</sup>

第三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成立初期较长的一段时

间内,中国在抗疫方面呈现出更多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局面。

1949年10月,华北爆发鼠疫。在新中国百废待兴、医疗卫生水平亟待提高的情况下,毛泽东向斯大林发电报,请其“空运生菌疫苗400万人份、血清10万人份至北京应用”;由于此前援助东北抗击鼠疫的苏联防疫队已在回国途中,毛泽东也请斯大林考虑再派一支医疗队来张家口帮助防治鼠疫。<sup>[10]</sup>苏联派来的专家是莫斯科第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授、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罗果金博士,正在返苏途中的苏联红十字半月协会防疫远征队也奉命折返中国。中、苏防疫队在察哈尔开展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在一个月就迅速扑灭了疫情。<sup>[11]</sup>当时中国专业技术人员匮乏,各类传染病防治均得到苏联不同程度的援助。苏联防疫专家来华不仅带来防疫器材和药品,而且在指导防疫工作、培养防疫人才等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抗击血吸虫病高潮之时,苏联专家科契尔金(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应中国政府邀请,在原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的陪同下,曾考察并指导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血防工作;<sup>[12]</sup>在疟疾、鼠疫等其他传染病的研究调查、技术支持等领域,也能看到苏联专家的身影。<sup>[13]</sup>当时全国各地的卫生防疫站,也是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一时期,中国也对非洲人民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防疫援助,先后向阿尔及利亚、桑给巴尔等多个非洲国家和地区派出医疗队。196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中国开始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接触,西方防疫卫生专家也陆续到访中国。以对中国血防工作的考察为例,曾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来华的就瑞士寄生虫病专家、12个国家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环境规划署代表团等。<sup>[14]</sup>

第四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通过对医疗防疫理念、技术、人员越来越

多的“引进来”与“走出去”,中国的抗疫防疫事业同其他事业一道,不断在“借鉴人类一切文明”中取得巨大进步,逐步跟上了世界发展水平;传染病防治法规、标准也渐渐同国际接轨。中国自1979年起承认《国际卫生条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1980至1983年还制定了《国境口岸传染病监测试行办法》《国境口岸卫生监督办法》和实施该办法的若干规定。<sup>[15]</sup>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多样,并逐步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一时期,2003年的抗击“非典”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外联合抗疫的典范。进入交通高度发达的21世纪,新型呼吸道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SARS)爆发后,很快波及全球30多个国家。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推动下,各国在查找病原体、绘制病毒基因组序列、寻找传播媒介、制造检测仪器、确定治疗方案等方面通力合作,其中多项研究成果都被无偿贡献出来供需要的国家免费使用。以对病原体的确定为例,2003年2月初“非典”在广东发病进入高峰;2月18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洪涛院士等专家通过电子显微镜首先在病人尸解标本中发现衣原体样颗粒,宣布初步判断祸首乃是衣原体;3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9国11个实验室组成联合网络,其中若干实验室提出对副粘液病毒的怀疑;3月24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媒体宣布,一种从未见过的冠状病毒家族成员最有可能是病因;4月13日,加拿大科研人员率先破译了怀疑与非典型肺炎有关的冠状病毒基因图谱;4月16日,荷兰实验室通过对一组非洲绿猴的实验,确认多国科学家高度怀疑的新型冠状病毒正是病原;当天,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SARS病原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sup>[16]</sup>可见,如果没有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不可能这么迅速地确定病原。世卫组

织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称赞说,抗击非典是近年来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第五阶段: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这一阶段,在医疗防疫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也在持续完善;中国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多国协作抗击世界性传染病的舞台上。仅在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方面,中国至少推进了五种自主研发的疫苗<sup>[17]</sup>,其中军事科学院陈薇研究员课题组研制的重组腺病毒5型载体埃博拉疫苗成为首个走出中国国门的全自主研制疫苗。

2020年上半年,被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在全球蔓延,在拥有抗击SARS、埃博拉等疫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迅速开始积极推动包括病源查找、基因测序、有效药物查找、治疗方案推进、疫苗开发等多个方面的国际合作。据权威统计,仅截至2020年5月31日,中国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两批共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向近30个国家派出了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援助。<sup>[18]</sup>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全球联合抗疫,获得了各个国家和国际人士的积极评价;而且,中国的对外合作行动目前仍在继续。

## 二、中国抗疫国际合作的演进逻辑

中国抗疫国际合作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鲜明的演进逻辑。要总结概括近代以来中国在抗击疫病方面的国际合作经验,科学回答国际合作对战胜疫病的重要作用,必须深刻把握中国抗疫国际合作的历史演进规律,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汲取历史留给当下的养分。

第一,越来越强有力的国家政治保障是抗疫国际合作的基础和前提。1910年鼠疫在东三省大规模爆发之时,东北政局极为复杂,其主权虽



归中国,但日、俄实际上以长春为界,将其南北分据为势力范围,美、英等国也在当地拥有巨大商业利益。它们争相为抗击鼠疫推动国际合作,事实上都想借此进一步提升在东北问题上的话语权。日、俄甚至宣称,中国无权对万国鼠疫研究会设置议题和炫耀自己的防疫成果。<sup>[19]</sup>当时已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将此事上升为关涉“主权”的紧急外交事件,外务部直接介入负责督办,经过频繁的外交交涉与主权抗争,才终于将万国鼠疫研究会的主导权握在手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政治保障弱,对外合作随时可能面临主权危机;国家政治保障的力量越强,才越能确保国际合作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实现。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撑和保障。人类抗击疫病的胜利离不开国际合作,近代中国的抗疫史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在医疗科技和防疫水平落后于西方的时候,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无疑对尽快控制住疫情颇有助益。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积极的国际合作,然而不可否认外部支援毕竟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在2020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时,我国医疗水平和科技自主研发能力已经有了极大提升,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中国迅速凝聚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各地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这场战疫行动让每个中国人都感受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更有底气。

第三,中国由向西方学习逐渐转变为贡献中

国智慧。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每当面临重大疫情挑战的时候,中国往往只能通过引入西方先进技术或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的方式进行国际合作。从晚清时期的万国鼠疫研究会,到抗战时接受国联、美国等的援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接受苏联援助;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各国医疗专家来华直接防控传染病的情况有所减少,但中国主动对外学习的情况逐渐增多,并且在疾病防治和应急机制上也在持续学习西方成功经验。近些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科技水平和防控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在控制好国内季节性、散发性传染病的同时,已经开始在抗击世界性传染病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尤其是本次新冠病毒肺炎出现后,中国的科研团队在2020年1月份就分离出病毒毒株,并最早独立完成了病毒基因组测序。随后,中国以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会协调能力迅速控制住疫情的表现,也为世界贡献了可供借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第四,中国抗疫国际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展、参与程度不断加深。近年来中国在抗击重大疫情方面的对外合作,已经从原先主要应对中国本土的烈性、慢性传染病,逐渐扩展到新发传染病;而且多次走出国门,参与到国内并未出现的全球性传染病的科学攻关与防治工作中。早期中外合作形式比较单一,主要靠外国医疗专家组访华,他们在传授防治经验的同时带来救援物资,不仅人数较少,防疫物资也往往达不到防疫实际所需。改革开放后,除了在出现重大疫情时应急式地“输入”外,中国也在不断对外学习交流中完善医疗体系和疫情防控机制,并通过法律法规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水平的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进入21世纪,网络普及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人与人之间的流动和交流,也让人类社会的抗疫协作更加迅捷和深入。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分享

疫情信息和防控有益做法,向国际社会提供巨量防疫物资、派出医疗专家组,还通过网络随时与其他国家共享科研数据,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等各种合作。

第五,中国通过抗疫合作增强了与他国的联系,越来越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抗日战争时期从反法西斯同盟的立场出发,国联和美国派出防疫队支援中国抗日;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则是出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扶持,苏联防疫专家来华。通过抗疫合作,中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与各合作国、各国际组织的联系,加深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企业、民间机构/人士以医疗卫生为突破口,广泛参与全球事务,努力提高双边、多边对话能力,积极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显著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变革与发展。

### 三、中国抗疫国际合作的时代启示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全人类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战而胜之。”<sup>[20]</sup>疫病的特点决定了全人类在共同的灾难面前必须团结合作。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中国政府在防控好国内疫情的同时,始终倡导和践行抗疫国际合作,致力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中国近代以来和当前仍在进行中的多次成功抗疫实践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启示。

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好政治主导力量,推动中外合作抗疫的深入发展。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不仅要对内领导各级政府、党员、人民群众众志成城把好防控关,还要对外团结各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趋势,打赢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全球合作抗疫,不仅是公共卫生事

件,更是政治事件。要应对和弥合各国在协作抗疫方面的政治顾虑与分歧,中国必须发挥好自身的政治主导力量,以更高的政治眼光和更长远的政治布局来看待抗疫国际合作,主张各国为全人类前途命运和子孙后代福祉作出正确的历史选择,积极同所有希望携手共进的国家深入交流、求同存异、守望相助。

第二,把持续提升自主科研和创新能力作为对外合作抗疫的关键环节。在对外合作抗疫中是被别人帮助还是帮助别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医疗科技水平的高低,这也正是决定各国在抗疫合作中居于何种地位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科技创新摆在十二项任务之首<sup>[21]</sup>,正说明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不仅是中国应对国际国内大变局的大布局,也是对外合作抗疫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sup>[22]</sup>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加快研发原创成果、提前布局专利、培养技术人才,从而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也必须在病毒检测、药物研制、疫苗研发等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不断攻关,才能掌握创新制高点和发展主动权。

第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sup>[23]</sup>“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矛盾,而是息息相关,二者存在深度交融、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内在联系。新冠疫情催生的中国抗疫模式,同“一带一路”倡议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我国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只有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建美好家

园,才能在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才能以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促进整个世界的合作共赢。

第四,以全球视野助力联防联控国际合作。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抗疫合作中长期扮演“学生”角色,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却能以高效亮眼的答卷贡献世界,还有大量抗疫物资、以及疫苗和药物不断运往全球各地。中国要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合作,就必须以全球视野看到欧美各国因为思维的历史惯性,要接受国际合作中中国地位和作用的改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这种情况下,中国自身更应放平心态:一要在对外交涉中继续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让合作方在更加平和的心理状态下适应中国的改变;二要对外继续讲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的抗疫理念和故事,超越单纯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各国利益的汇合与共同生长。此外,中国还应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全球抗疫领导作用,加强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采取科学合理、协同联动的防控措施,稳步展现大国的责任担当和主动作为。

第五,以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合作应对体系的建立。疫情之下,中国以实际行动向应对疫情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时联手各国通力应对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国一贯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国际合作,推动多文化互鉴交流。未来有必要也有可能持续通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加强对话交流和政策协调力度,通过多边合作不断扩展合作空间,形成点面交织的合作网络,逐步促进共同合作应对体系的建立,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并最终健全完善惠及全人类、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 注释:

- [1][20][23]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求是》,2020年第8期。
- [2]《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1912年。
- [3]《议设万国防疫大会》,《申报》,1911年2月12日。
- [4]焦润明:《清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0~278页。
- [5]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Bureau of Printing, Manila, 1912.
- [6]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9~46页。
- [7]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343~344页。
- [8]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 [9]朱建华主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4页。
- [10]《毛泽东关于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给斯大林的电报》(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5页。
- [11]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535页。
- [12]黄陂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陂文史》(第3辑),黄陂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年,第191页。
- [13]洪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洪雅县志》,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63

页。

[14]无锡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无锡市卫生志》,无锡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1993年,第105页。

[15]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卫生年鉴》(1983),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第102页。

[16]逢键涛、苏文娜编:《最新非典型肺炎防治问答》,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17]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发展报告:2014-2015》,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30~31页、第47页。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0年,第80页。

[19]《北里博士行程》,《盛京时报》,1911年3月21日。

[2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zywj/2020-11/03/c\\_1126693293.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zywj/2020-11/03/c_1126693293.htm)。

[22]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3日。

作者简介:刘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3。

(责任编辑:杨思奇)